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从理学到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美」艾尔曼 著
赵刚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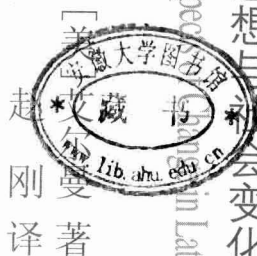
刘东主编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从理学到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赵刚著
刚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美]艾尔曼著;赵刚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9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7348-8

I. ①从… II. ①艾…②赵…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1694号

书 名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著 者 [美]艾尔曼
译 者 赵 刚
责任编辑 周文彬 沈 亮
装帧设计 陈 黎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2
字 数 186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348-8
定 价 2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著者中文版序

最近,我高兴地获悉拙作《从理学到朴学》中文版已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先,我衷心感谢故宫博物院陈列部的赵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先生。赵刚先生花费大量精力、时间把此书译为中文,雷颐先生认真审定了译稿。再次,我向挚友,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洛杉矶加大访问教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王俊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陈祖武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书的中文版是无法问世的。最后,谨向戴逸教授、杨向奎教授、汤志钧教授致以深谢,在我1983~1984、1992、1994年秋三次来华访问研究时,他们及所在单位均给予我巨大的帮助。

《从理学到朴学》是我首次来华之前完成的,1983年来华之后,对此书作了进一步修订,然后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出版。此后,我得到美国全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于1983~1984年来华从事研究工作,以此为基础,完成了我的第二部著作《经学、政治、宗族:中华帝国晚期的常州今文经学》。该书主要论述了常州今文经学,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获1992年度的伯克利奖金,该奖每两年颁发一

次,以奖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优秀东亚研究论著。没有1983~1984年在华获得的新资料,我是不可能获得这项奖励的。

《从理学到朴学》出版后,得到欧美、日本汉学界的好评,获1985年度费正清奖,日文本正在筹划之中。该书第一版售罄之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又于1990年出版了平装本。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注意本书综汇学术史、社会史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它采用了欧美最近出现的“新文化史”方法,这种方法摒弃了传统学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作法。中国学者将会发现,《从理学到朴学》一书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一考据学赖以生存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后为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摧毁。

本书还着重讨论了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与传统著作中俯拾即是的思想史研究理路不同,本书更注重“哲学的框架”(fieldwork in philosophy)。读者若对这种新颖的文化史研究方法感兴趣,可进一步阅读前面提到的最新出版的《经学、政治、宗族》,该书从武进庄氏与阳湖刘氏两个家族长期拥有的显赫地位探寻常州今文经学的兴起。乾隆末年,庄存与转向公羊学,嘉庆初年,刘逢禄运用考据学为今文经学辩护,这些现象都可以从庄、刘两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声望加以解释。1780~1790年和珅擅权也是刺激庄存与重视公羊学的重要因素。除此而外,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著《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十二期,1992年5月,页1~15)。

我希望这部书的中文版能为中国读者批评指正。1984年,本书英文版问世时,应我的请求,出版社在封面印上了篆书“实事求是”四个字,因为考据学者动用古代遗物复原古史,成为现代考古学研究的先驱,1984年以来,“实事求是”的主张再度在中国广为提倡,犹如18、19世纪之际的乾嘉学派。

与清代考据学相比,现代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有相当大的改进,但这并不能抹煞清代考据学通行的研究方法的历史意义。现代中国学术固然深受西方学术和科学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现代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人员曾受惠于清代学者的考证成果,如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研究,戴震的声类研究,段玉裁《说文解字》的研究,王念孙的训诂学研究。没有清代金石学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中国考古学者恐怕不可能释读甲骨文。清代考据学的许多特点常使我们想起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众多思想家和学者。此外,17、18世纪的考据学、实学思潮还东传日本、朝鲜,推动了18世纪朝、日两国实学的兴起。

最后,我再一次向所有为本书中文版问世尽心尽力的同仁致意。

1994.11.1 于北京

著者初版序

如何区分清朝衰亡和中国传统社会整体性崩溃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令现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极为困惑的复杂问题。最近，孔飞力(Philip ^{xix} Kuhn)在对近代中国早期历史的精辟论述中，对此提出了新的答案。他认为，只有假定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才能承认，惟有西方势力的介入，才加速了传统王朝体制的解体，导致横扫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不过，他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表明，早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已开始崩溃瓦解。

只要我们把清代历史的研究重点从社会关系转向学术思潮，就不难发现，知识阶层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 18 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趋尖锐的挑战。这种挑战明显反映于他们的语言、数学、天文、地理、金石实证性研究之中。18 世纪的知识分子，运用这些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儒学遗产众多理论的合理性，对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所充斥的空疏之风极为不满。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 ^{xx}

要研究清代考据学运动的广泛影响,就必须了解它赖以形成、发展的学术共同体。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长江下游地区已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当时,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研究的的发展,不属于本书即将讨论的考据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换言之,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不同于政治官僚,他们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但是,这个群体影响巨大,意义深远,聚集着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他们通过知识传播的组织与机制走到一起,就寻找、发掘知识的途径达成共识。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对专业化学者形成的共同体与技术性写作实体的关系进行过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本书将运用他的研究成果,探讨清代学术共同体的总体特点,重点分析清代学术形成内在与外部的成因。此外,我们还将借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阐发的“话语”理论。我们认为,考据学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学术性谱系和意义。实证方法的形成、流行,展示了17、18世纪中国在语言使用和意义上的剧烈变化。作为思想学术事件,实证性朴学话语特点的逐步形成是基本学术观念变化的反映。后者同时还引发了对传统认知和理解的更重大的基本变革。从前公认的学术范式受到了致命挑战。

本书第一章将集中讨论这场学术话语革命发生、发展的脉络。第二章将深入讨论17、18世纪的学术成果及其透露的学术走向,介绍考据学者的文献考证,史学、科学建树。第三、四章将阐述考据学专业性学术共同体产生的社会、学术机制,这种为江南中心城市的考证学派形成而建立的机制还是中华帝国晚期学术研究“职业化”的标志。

18世纪的考据学研究是在一个生机勃勃,充满进取意识的学术环境中展开的。这种环境即是本书第五章的讨论重点。那些采用实证方法的考证专家,经过不懈努力,在清代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自主,拥有独特学术规则的社会群体。它尽管受到太平天国战乱的破坏,但

是,其学术遗产并未消亡。考据学派的出现毕竟拉开了中华帝国晚期重新审视正统儒学传统的序幕。

时至今日,18世纪的中国史,也即“康乾盛世”,仍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当然,并非没有别具慧识的学者。但是,中国近现代多数学者在探索和重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险象环生的历程时,只重视17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对于18世纪则有所忽略。本书下面将指出,18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17世纪以来政治、学术变革的延续及其发展的极致,其影响甚至播及19世纪乃至20世纪。18世纪的历史是17世纪满族入关到19世纪西方入侵的漫长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不应被孤立出来,搁置一边。 xxii

对于这段充满变化而又为现代中国史学家长期忽略的历史,本书的研究仅是一个引子和开端。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些研究提醒那些对18世纪兴趣日趋浓厚的学者,对有关这段历史的传统观点需做进一步的修订和检讨。我们还希望本书在推进美国学术界重视18世纪中国史方面能尽绵薄之力。本书分析了18世纪众多的历史线索,但是,还有许多历史线索有待澄清,不少本书无力涉及的学术空白亟待填补。总之,我们的讨论不是研究的终点,它只是对这段历史研究的开始,仅仅扫清了某些障碍,为后继者的进一步探索铺平了道路。

目 录

著者中文版序 1

著者初版序 1

第一章 中华帝国晚期的学术话语革命 1

第一节 江南学术界的内外环境 3

第二节 清代政治与学术 8

第三节 理学的解体 18

第二章 考据学派与公认的认识论观点的形成 28

第一节 考据学的出现 29

第二节 明亡的冲击 38

第三节 实证学风的冲击 44

第四节 专业化与实证学风 52

第三章 江南学者的职业化 67

第一节 考据学派的社会起源 68

第二节 中华帝国晚期的职业化 74

第三节	官方与半官方赞助	78
第四节	江南学界与书院	89
第五节	士大夫社会角色的转变	103
第四章	学术、图书馆、出版业	111
第一节	江南的藏书楼	113
第二节	江南出版业	120
第三节	资料收集与考证研究	127
第四节	乾嘉时代的目录分类	129
第五章	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	134
第一节	通行的研究方式:札记体著作	135
第二节	考据话语中资料运用	138
第三节	协作、书信和会晤	152
第四节	累积性研究	158
第五节	学术发明权的争论	171
第六节	考据学派的“进步”意识	177
第六章	考据运动的终结	180
第一节	考据运动的衰落	180
第二节	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	193
结论		198
参考书目		201

第一章 中华帝国晚期的学术话语革命

1

中国从帝制时代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西方史学家总是认为,中华帝国发展到晚期,业已腐朽衰落,失去生机。他们在向前追溯鸦片战争(1839~1842)和太平天国叛乱(1850~1864)的历史根源时,通常把中国在现代化运动中的落伍归咎于18世纪及以前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国当时衰弱、停滞,欧洲朝气蓬勃、正在走向工业化,双方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过于肤浅,业已过时,它完全忽略了宋(960~1279)、元(1280~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各朝对中国现代化的出现、儒教传统的式微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书认为,17、18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²

17世纪,儒家知识分子毅然摆脱了前代儒学理论框架的限制,他们提倡客观实证学风,要求通过这种方式,恢复理想的古代社会,并以此为突破口,向官方正统学说发动猛烈攻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主张与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语言学家洛伦·维拉(L. Valla 1407~1457)、德塞代洛斯·爱拉斯摩斯(D. Erasmus 1466? ~1536)的观点是非常相似的。清代小学家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追求语言的简明、清晰、纯净,³

这种追求引导他们揭露当时通行思想及表达方式的种种谬误。他们也像维拉和爱拉斯摩斯一样,虽然是道德革新者,但却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先驱。他们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渴望消除语言混乱,以此奠定人类永恒秩序的基础。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①

历史学者逐渐认识到,17世纪中国在学术和哲学领域已开始出现重要转变。1644年,明朝为清朝“夷狄”所取代,这一致命的打击使许多亲身经历这场巨变的士大夫进一步认识到理学话语的陈腐和危害,他们严厉指斥理学见地荒诞,背叛儒学真谛,最终导致明末的社会大崩溃。^②

明亡前,内圣之学极富吸引力,令中国多数杰出学者心醉神往。宋、元、明儒学都倡导个体的道德完善,西方学者把这种思想模式称为“新儒学”。新儒学主张,只要每个士大夫都成为道德楷模,儒家的理想社会就会复兴和繁荣;知识和行动是一致的,政治、文化的稳定取决于每一个体严格的道德修养。

宋明儒学家为论证其道德学说,发展出一套精心构致、相当系统的天人相谐理论。他们对世界万物生成的结构、差异的宇宙论模式作过深入研究,认为自己已最终洞见到人及其道德心性能力在一个变化有序世界中的位置。他们还认为,要成为圣哲,就要有一种崇高的洞见,也即一种本体性洞见,换言之,即能认识到人是构成一个在道德上、理性上至善至美的宇宙的核心因素。

然而,到1750年,继新儒学而起的清代知识分子业已变成一个世俗性学术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鼓励严格的富有创造性的文献考证,还为之提供生活保障作为学术奖励。与其理学先辈相反,清代学者崇尚严密的考证、谨严的分析,广泛地搜集古代文物、历史文件与文本保存的客观

261 ① 凯莱《现代史学的基础:语言、法律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史学》(纽约,1970)页19~50;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基础》第一卷(剑桥,1979)。

② 帕特森《魏瓜:方以智与学术变迁的冲击》(纽黑文,1979)页1~17。

证据,以具体史实、版本及历史事件的考证取代了新儒学视为首要任务的道德价值研究和论证。现在,成就圣人的个体道德理想在严肃的儒士心目中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梦,不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传统学术历史上,清代学术代表了崭新的极为重要的转变。我们从当时学术话语发生的革命中,可以发现一个代表儒学最后的伟大传统的杰出学术共同体所取得的进展和创造性成果。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一崭新的学术进展在重新确立中华帝国晚期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时发挥的作用。清代知识分子开创、维护的实证性小学传统即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本书涉及的多数学者生活在长江下游物产富庶、人文荟萃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他们在当地和帝国的首都北京,潜心研究,探寻儒家文化的根基,为我们认识古代中国奠定了基础。他们的探索是中国历史上在学术研究领域发生的多次最富有创造性的转变之一。他们汲取、重构并革新了儒家的学术研究传统。迄今为止,中国学仍受到他们建立的研究方法的影响。

第一节 江南学术界的内外环境

7

一、内在理路和外在变迁

我们要弄清江南考据学者共同体以及专业化程度不断发展的学术界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的脉络,就必须考察把朴学家们和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结构。清代学术话语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学术本身的变革,以及规范性研究、著述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的变化。^①

^① 关于“环境”一词社会学意义上的定义,详参奥顿《科学社会学,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芝加哥,1973)页373。

要进行我们的研究,仅依靠一种理论框架是不够的。我们将从米歇尔·福柯、托马斯·库恩等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借用某些适用于中国的观点。我们还将考察一种学术话语内在发生的思想突破,以及与学术发展相应的外在而必不可少的社会、政治因素。学术话语剧烈变化的历史过程仰赖于学术本身的内在机制,它向那些需要的学者提供有用的专业术语、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本书将详细考察清代内在学术理路和外在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

要深入认识清代江南学术共同体,还要弄清其成员通行的教育和学术交流模式。考据学是一种群体性事业。不了解朴学家的群体特质,就不能准确把握其实证方法的走向及其发展方式。17世纪,明朝灭亡引发了剧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危机,许多学者受到这一危机的冲击,开始提倡实证学风,18世纪考证学派提出的许多社会和学术观点,如同他们的研究方法,同样受到前一世纪形成的广为流行的训诂考证学风的影响。^①

17世纪中国开始出现的学术变革,如果没有适宜正在形成的新学术话语传播的学术机制,就不能在18世纪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冲击力。尽管清代多数进士不是朴学家,但是,他们通过提供经济资助推进了新学术话语的发展。这个社会在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考据学共同体的生存,因此,清代社会特质就是我们首要的研究对象。

二、江南地区的交通和地位

唐代(618~906)中叶,中国发生了中世纪经济变革,此后,南方人控制着学术事业,北方人尽管在重要政治活动中仍有一席之地,但在文化事业中失去了主导地位。宋、元、明三朝的多数重大学术、艺术、思想运动,都是由南方士人首开风气的。1644年,满洲入主中原后,江南知识分

^① 有关学术内在理路和外部环境差异的讨论,详参库恩《必要的张力》页105~126、293~319。

子开始对明亡引发的文化困境进行严肃反省。他们从道德修养转向实证研究,这是中国社会对明亡反应的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江南地区是中华帝国晚期商业和交通的中心。清代文化事业主要集中于江南各省。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是中国早期王朝大量人口从北方平原向江南丘陵、谷地及东南沿海迁徙的产物。隋、唐、北宋(960~1127)建立起新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向比以前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仕途,加速打破北方士族对政权的垄断。

唐宋以降,江南诸省凭借由长江、运河、太湖交织形成的交通网迅速发展,到明清以后,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内陆商业区。当地的城市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许多城市成为商业枢纽,日益繁荣。^① 南京(明朝的两都之一)、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堪称中华帝国晚期商业化程度最为发达地区的中心。苏州地区位于江南腹地,是中国主要的稻米、茶、水果产区,从元代起就成为文人学者聚集的中心。苏州不仅是制造供应出口和国内市场种种奢侈品所需丝、棉的主要产区,也是一座艺术和商业同步发展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苏州士人在文学、音乐、戏剧、书法、绘画领域依然深具影响力。

江南既是大运河南端的终点,又是长江的入海口,因此,当地区域性的贸易系统成为全国性的谷物、食盐、纺织品贸易中心。明清两朝,许多陕西、山西商人,千里迢迢,从西北迁往江南,在江、浙两省从事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这些省份有利的商业位置使淮安,特别是扬州,变成朝廷盐政和发往北京的漕粮的重要中心。两淮盐政就设在地处长江、淮河及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负责管辖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及贵州的盐务,其产销量、税收额远远超过其他地区。陕西、山西、安徽盐商出于商业、享乐的考虑奔赴扬州,这些外来客赋予扬州以大都市的风情。

^① 详参施坚雅《19世纪中国地方城市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页211~249;《农耕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亚洲研究杂志》,1964~1965),又参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谈》(上海,1957)页1~23,该书认为“江南”和“长江下游地区”是意义相同的概念。